

## 左翼浮沉歷史與運動組織的始與終<sup>\*</sup>

2014年6月29日，二十六名工作室成員在停會一年後，參與了三個半小時的會議，各自表達了對當前同志關係與組織轉變困難的看法。最後決定此一由1988年成立之運動組織，在29日會議結束時，即刻自我解體。《左工》書出版時，我與吳永毅曾共同投身的運動組織已經結束。2015年1月，我修改《左工》一書與談發言稿寄給編輯部後，始知與談文字的刊出，並非我原先以為的現場實錄。幾度思量，本想撤稿，因為本以為吳永毅於座談會最後回應時說了二次的「我公報私仇」，可以平反些許「出書」帶給我的不對等感，然而，在刊物有限條件的考量下，我面對了是否要大改文章，以與其他三篇文章風貌較相應吻合。最後，仍選擇尊重無法再現現場的現實與自己當前條件的有限性，故此文仍以回應文之原貌，僅刪除口語贅字若干，加上小標與文章名，並於文末更動數行用詞，以求更精準明朗表達出我的抵制性為何。

我是夏林清。剛剛主持人卡維波(甯應斌)一開始有說，台灣在左翼的這個位置中，在我們這個世代，和國際左翼基本上是斷掉的。國民黨1949年後統治台灣，左翼歷史可以說是被戒嚴政治掩埋掉的。對我來說，社會永遠都

<sup>\*</sup> 本文為「台社論壇：工運組織者失語年代的告白」(2014年5月18日，台北月涵堂)之發言修訂稿。

airiti

是一個鬥爭的歷史，社會鬥爭的歷史本來就是起起伏伏的，有的時候可能一整代人被殺了許多，有的時候你的一個啟蒙是來自於一個已死掉的人的一個隻字片語，然後你自己有某種莫名的情感被召喚了，就飛蛾撲火一樣的進場了。這就會是你自己在屬於這個地方的歷史中的你的實踐。所以我想從社會鬥爭的起伏歷史視角和視任何一位運動者、組織工作者都是在特定社會體制的某一個夾層位置裡面，他們在裡面努力行動看能不能夠讓社會有改變。我從這兩個角度來參與對談吧！

## 一、參與對談的七個疊置角色

吳永毅是一個如其書所展現出來的，思慮細膩、鉅細靡遺的人，他在第八頁也說到他寫東西都會有避險策略，意思就是說他會非常細緻的處理各種線索、各種聯繫，設計出一個迴避危險的策略。「二流書」，以一種個人史的方式，記錄了台灣七〇年代，後七〇、八〇，所謂的美國左翼拉派留美返台，以及後續吳永毅如何加入到工作室，然後又離開了工作室的運動群體的組織生活。吳永毅跟我的關係，讓我現在坐在這裡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只說我是與談人，因為那是不真實的。我身上有七個角色都和他有關，有些直接，有些間接有關。(1)解嚴前國民黨一黨專權歷史過程中，萌芽的反抗者。我是外省二代，一名戒嚴時代萌芽的女性的反抗者。(2)我是工作室的創始人和開創成員，因為工作室成立的確是我和鄭村棋主導的，當時是與一批青年人共同開創的，從鋪地板到修屋子，所以我是創始人和開創成員之一，這是我的第二個角色。(3)吳永毅書中幾次描述的，第一線的工會工作者的協作督導，這是第三個身分。(4)在工作室此一運動組織中，主要負責搶公糧與轉資源的成員。我一直在搶公糧，不管是研究案也好或者是寫小的案子也好，搶公糧然後把資源轉到當時沒有資源的運動團隊內部，在組織內部，這個位置上的我，是一個後勤的成員；然後更重要的後面三個角色是，(5)我是吳永毅書中的焦點衝突人，他書寫的焦點衝突的故事版本中，我就是那個主要的衝突人之一；再來一個，(6)我是他的博論的口委，同時那個

時候的我，又是以同志立場去支持他寫論文的，所以我是他的博論口委兼同志；(7)最後是當他這本書出來的時候，我又多了一個位置「與談人」，左翼的實踐知識出書了，出書和論文是兩件事，「書」由誰出，如何出，有什麼社會效應？「出書」是公開化的文化行動，它的政治效應進入了社會生活中。因為有這七個角色，所以我後面的回應，會跟每個角色有關。我前半段的回應，比較是前面四個，後面再扣回到博士口委、同志支持人和左翼實踐知識(今天)的與談人。

## 二、歷史脈絡中的左翼工作者

今天台上的每一個人我認為都共享過左翼熱情，可是對左翼熱情的某一種社會想像可能就不同了。年輕的時候，每個人左腦的發達程度也不一樣，(「左腦」我特別是指讀了理論比較能夠論述的人)，每個人身手能力也各異。同為左翼的朋友們，各自立足的方位和作用的力道，有可能相合，也有的時候它是相左的，這種動態關係是自然的，因為在一個大的社會立體狀況中會是這樣的。今天在這樣的一個聚合場，面對台灣歷史裡的左翼力量，這本書的前面、中間和後面到底反映出來了什麼？

我和台上幾位還有坐在台下的丁乃非、陳光興、王蘋及吳永毅之間，由過去到現在，都有遠遠近近、或直接或斷斷續續的互動。我們彼此之間在不同的歷史過程中可能有矛盾，但仍然有左翼的某些共同的認識與情義。我們之間的差異張力並不是人際矛盾，不是人際關係衝突。我們不能夠把它當成入際衝突，這種歧異張力也不能化約成去歷史與去社會脈絡的一種化約的反權威或性別權力等說法的戲碼！左翼的工作者得將實踐放到歷史脈絡裡，工作者或運動者之間的矛盾與歧異衝突是要放置回一個歷史過程中與社會關係的脈絡與個別和群體行動者各自具有的社會條件差異中去看待的。所以，我是吳永毅書中的焦點衝突人之一，我們之間的關係是承載著具有特定歷史社會脈絡的矛盾。

1976年，左翼熱情把我搞的昏頭腦脹投身實踐學到的第一課就是：人在

airiti

社會關係中，對利益的覺察和對待。我永遠認為我是在一組又一組的一種社會關係中移動的，而社會關係是有利益的，各種矛盾利害的判斷，我不能夠迴避、也不能夠說它不在。對這種東西的覺察和對待，是我學的第一課。不忘初心，今天我帶著我學到的第一課坐在這裡，今天的聚會和討論也是我們在歷史中再次經驗彼此的一個時機。

那我是什麼樣六十二歲的左翼女性呢？左翼熱情想像這個不再說了，但是為什麼會投入運動？那是對國民黨白色政治恐懼的一種拮抗力量，所以七〇年代後期，我就比較走入這樣的一條道路。但我的「左腦」並不發達，我不常使用左的理論與語言，可能對某些東西從直覺就去做，我是在台灣有了實踐經驗之後才出國唸書。我常說我是跑過我的美國老師的練兵場，他們發展的東西是在處理美國社會裡面高度工具理性化的困局，也就是說他們經驗到社會科學專業化的工具理性對解決社會問題，其實是無效的。所以他們發展出一個想要從內部解構專業的工具性格的一套實踐的知識和方法。為什麼我說是洋人的練兵場？因為1983年坐在哈佛課堂中時，我和美國同學在思索與面對的問題不同。1983年我在哈佛大學「行動科學」課堂上寫的第一篇報告是，毛澤東長征的時候，他的理論和他的實踐間可能有的矛盾？我用「行動科學」提問，跑去找一些資料，因為當時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能夠找這些書，我想毛澤東那麼會打仗，把國民黨打得落花流水，然後又一路長征，還發表一堆戰鬥文章，我那時候在想，他的理論和他的實踐一致嗎？你可以想像，在美國和歐洲人都坐在一起的教室裡，每個人腦袋想的，真是南轅北轍！我的法國同學可能在想他跟佛洛伊德在論辯，而我想的竟然是毛澤東，我還真寫了一篇這樣的報告，得了個A。這要講什麼呢？我覺得我有一些變造工具的能力。其實我出國沒待多久，碩博士合起來我在美國待的時間不超過四年，包括最後寫論文，就是四整年，我在台灣的具體經驗，讓我一直在琢磨，也在磨這種變造工具，怎麼把房子造起來的能力，怎麼把人帶住的能力，變造工具、搗土鋪路，學歷的資格則是讓我可以做一些交易的入場券和價碼，我可以轉身把公糧拿來養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與青年工作者手把手一起由運動實踐中長出一種手工技藝、運動實踐是一種特殊的勞動技藝，它

具有地方性手工技藝的特性。早些年我常去香港、日本等處開會，在那樣的會議裡，常覺得跟外國的工作者，講起來牛頭不對馬嘴，後來才摸索到一個可以跟人家互相參看認識的方法，就是我一定要把國際的眼光拉出來，看到別人的運動歷史是怎麼樣，我才能夠相接。有一年，我去香港開會，開完之後就有兩個歐洲老外，一個法國人、一個瑞典人，人高馬大跑來主動跟我聊天，我搞不清楚他們是誰，結果會開完後他們就尾隨我跑到了台北仁愛路的工作室樓上，後來我才發現他們是瑞典的無政府主義成員，那個時候我們工作室還搞不清楚什麼是第幾國際，不過這兩個人很可愛，工作者就著騎機車載著他們在台北市亂逛，那個時候才有機會去了解歐陸左翼的無政府主義，因為我從他們那裡知道，瑞典有無政府主義的青年組織，我非常驚訝他們怎麼可以發展出青少年的政治性組織！在台灣，年輕的時候，會走入這條道路也是因為我做青少年犯罪的街頭輔導員，充分經驗到那種無力和痛苦～那是社會問題而不能只說是家庭問題。再回到台灣運動的歷史裡，我和鄭村棋都不是美國拉派或者拉左有意栽培的，其實拉派也不過是一個回到台灣的一個階段性的聚合表現，吳正桓(我有趣的老朋友，他是我大學的好朋友)其實也只是1982年被我介紹，和鄭村棋一道去參加過讀書會，因為那時候我在帶小孩，沒辦法參加。運動歷史是需要有更多不同細節的故事或資訊，才不至於過度化約而失真。

### 三、運動組織與組織工作者

這一段我想說的是，運動組織和組織工作者。台灣這三十年，由解嚴前轉入解嚴後的工作室、工委會和工運，注意這三者是不一樣的；一開始就只是一個「工作室」，在自主工會工運高潮迭起的時候，組織了「工委會」推動了三法修法的運動，然後才是「工作室」與「工委會」在台灣自主工會運動中的作用。在台灣解嚴後參與這個工作室，也是我成年生命中最核心的磨練，運動組織的歷史是重要的。「工作室」這個團體的創發是什麼時候？它有怎樣的一個組織發展的歷史？坐在我右邊的謝國雄，其實在工作室醞釀期我就認識

他了，當時是解嚴前，1986、1987年，那時候在我家芝山岩的客廳，進行美寧(芭比娃娃製造工廠)和小外包廠調查的工作討論，當時謝國雄在念博士，也來參加過我們的調查討論，所以我跟謝國雄的緣分更早。然後再轉到吳永毅描述的仁愛路，就是1988年，團體動力協會成立的地方，現在跟我一道工作、當時創會的小學教師侯務葵也在現場，接著我們成立了ICLE(勞工教育諮詢發展中心)。然後，1988年中時抗爭，遠化罷工，我是在中時抗爭的時候認識吳永毅的，1990年是機場聯誼會成立的地方，我稱這個階段叫草創階段，我是這個草創階段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到1992年之後，就是基隆的倉運聯成立、基客罷工、台灣自主工會運動，戰役四起，在那時候吳永毅進來，吳永毅、阿香(陳素香)和鄭村棋是核心領導小組，他們三個人真的是非常好的戰鬥團隊，帶著工會的工作者前進，我都不是在一線工作，在這個階段我分擔部分的工作實務督導的協作工作和大量的後勤。所以在工運高峰期的時候，我是這個戰鬥力強的工運團體組織內部的一員、而我的位置是在工運具體鬥爭工作系統外圈的一名成員，整個工委會和修法我都沒有在裡面；所以，我並沒有如同這個團體中其他的組織工作者被磨練，這些年輕的工會組織者在經過三年、五年之後，對工會法的鬥爭都瞭若指掌，我沒有，因為我那時候在後勤的工作位置中。

1997年因為公娼抗爭我得到一個機會，我跟佳君和芳萍緊密協作，還有其他人一起，那是大家一起打的一場仗，然後又籌辦了社區大學。2001年以後的運動，整個歷史條件和社會進程變化了。工作室的組織者也到中年了，整個工運的局勢迅速變化，一波波關廠都已經底定，在那種情況下，我提出「一個運動者的個性性」的方向，在內部工作。其實是想要把他／她前面二十多年的工會組織的實踐能耐能夠認受起來，說：「這就是我，我在這裡搞工人的組織工作搞了十幾二十年了，從二十歲長到了四十歲，這是台灣歷史的一個部分，我投身在其中長成了我這個樣子，我要來收整它、認受它，我就是一個運動者」。會這樣提，是因為工作室組織是一個小群體，我們的群體本身也創造了台灣工人運動中的一些歷史條件，但同時也因為高強度的運動任務，彼此關係承載了不少碰撞、摩擦的經驗與記憶。所以，我企圖提

出「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說法，來讓每個成員辨識與認受我們參與創造的歷史以及作為行動主體的社會存在質地。

阿香和當時其他成員稱為二哥的吳永毅是主要的帶領人，我對他們兩個的情感和情誼有不同的距離和狀態，後來，我提出了另外一個組織變化的方向，就是「分進合擊」，我當時想用這個方式來變化我們的組織，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組織已經有好幾個是運動取徑的小人民團體。人民團體不能夠大，尤其台灣這麼畸形地用我們的健保給付，和社會福利資源輸送的方式養大膨脹了一千人到兩千人之間的大型社會福利團體，其實都是國家健保費和社會福利的資源，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支既已應形勢變化而生出了一些小的人民團體，就應該是運動取向，想辦法用一點錢養自己，因為不同的小組織，每個組織的地形、處境都不同，我們應該「分進合擊」。用這樣的方式把我們的組織或可在解構過程中重構，我想像的是「就地解散，在實踐的後續進程中，重新發展彼此之間的關聯性」。近十年的「工作室」已非昔日的組織圖像，但因為我們前面經過這樣的磨練，所以我們真的相當認真地對待彼此，這個運動組織的矛盾衝突現象，考驗著每一個人如何調動他自身前面二十年的運動組織的智能，他也要挑戰自己的習性、癖好和習慣的行動，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很難以變化的習慣，含我在內。吳永毅書中也有提到，我和鄭村棋後來都學佛，這個機緣是另外的故事。但是我真的認為，人有一些習性，他就是自己先認受，才會再有一些變化的機會，所以這十年真的是重要的挑戰階段，大家都在圖謀如何突圍脫困、再創生機，某個角度我也是這麼看吳永毅和陳素香，雖然在這個階段裡(2001年後)他們並未參與組織例行的聚會，我覺得他們也在努力想要發展出他們自己的道路，只是大家在發展這樣的道路的時候，彼此如何對待？關係性質的變化又是怎麼展現的？這倒是此刻的真實情景了。

#### 四、運動組織的歷史與左翼浮沉的歷史

接下來我覺得考察和探究運動組織有三個要件是不可或缺的，一個要件

是組織的歷史。每個組織都有他的一個在當代這個社會裡的組織歷史，要考察一個運動組織的樣態與發展歷史，同時要看到社會制度性環境和左翼運動的浮沉歷史。當時吳永毅剛去香港唸書時，大家是期望他寫一個台灣的工運史，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沒有人有時間、有條件、有機會這麼寫，那時候所有工作室的同志都公認為吳永毅是最能做這項工作的人，今天《左工》書的這種轉折，使原先期待失落了，但未嘗不是一種磨練和砥礪。

我自己最早的左翼啟蒙也不是拉派，也不是國外的什麼書，其實是《夏潮》雜誌，是1973、74年蘇慶黎創辦的《夏潮》雜誌，我帶的第一個西方小團體是跟鄭泰安醫師（當時他剛剛跟蘇慶黎離婚，而且掛名夏潮雜誌社的發行人），在《夏潮》雜誌社晚上的辦公室中進行，見證了雜誌被警總抄走之後的一片散亂，我和一個精神科醫師坐在那裡帶西方小團體，你們能想像這個古怪的景象嗎？我前一陣子寫了一篇文章，說我在中國熱炒鍋上做蘋果派，就是那種團體方法是蘋果派，它是美國烘焙出來，而我的起點就是坐在那裡的時候，一方面聽大學生的愛戀故事，一方面後腦全部是涼的，因為那是一個雜誌被警總抄走的《夏潮》雜誌社，這就是台灣的歷史，左翼歷史的沉浮是重要的歷史真實。

第二個要件是組織工作者，也就是運動者，我一定要說組織工作者是運動者的核心，不然運動太容易淺短，組織工作者的心性、精神和智能的樣態各有不同，我不認為有一個人一定是適合做哪個才是最好的，我也覺得這裡面就包含了對組織現象的詮釋和關係對待的方式。

第三個要件，組織在社會中的運動實踐的具體表現，這點很重要，一定要考察這個運動組織幹了什麼活兒，那些活兒在那個社會發展過程中發生了什麼效果、作用？

若由運動組織如何被記錄與考察的角度來說，《左工》一書是中途進入亦提早脫落的一位成員的自傳史。工作室由1988年設立到2014年6月29日結束。在那個歷史中，書中的我，是他眼中的我和組織，我和工作室老同志們共享過去的歷史，吳永毅參與了工運高峰期，他進工作室之前與2001年後的組織生活，他基本上是未參與到的。



## 五、抵制與距離

第三點，我想談後面我那三個角色，從博士、口委到此刻的與談人，這一、兩個禮拜，我看了好幾遍這本書，我還把論文舊版拿出來核對。我會形容，我目前和書有一個距離在，我要把這個距離感跟大家報告清楚那是什麼。書出來了，可是我很清楚感覺到一個距離！我來參加與談，一定程度是因為陳光興的邀約，我在陳光興的邀約中感覺到某種情感和善意的擔心，我不確定，陳光興的邀約是什麼，我通常對於這樣的邀約都不會再去盤問任何東西，我選擇來場中敞開，看這個過程在發生什麼，所以我來到現場。我現在坐在這裡要與談，經驗到了一個距離。

這個距離就是一個抵制，我很清楚要告訴你們我在抵制什麼：第一，我在這個地方，這是一個地方，我在這個地方抵制，吳永毅由論文到出書的製作機制和過程形塑成了一個相鬥與控訴的完成式，我對他的這個動作抵制！為什麼抵制呢？我的道理是：當一個人把組織內部的矛盾外部化，就等於要發展成內鬥！「組織內部的矛盾與衝突」和「用外部化的方式來進行內鬥」是兩件在社會關係質地上不同的事。「組織內部的矛盾」，我自己，我相信也是大部分我的老同志們，並不覺得要把它變成「內鬥」，即使是兩位同志都在我眼前打花了，我也不見得要把內部衝突說成是內鬥，更不會選擇用外部化來搞成內鬥。所以，我抵制！矛盾衝突也不等於路線鬥爭，「路線」一定是左翼實踐在具體社會進程中，有「社會鬥爭」的顯現，才會去辨認它是不是「路線」，不然我覺得它不叫路線。太輕易說「路線」，會讓具體的社會實踐的進程被錯認，這是我的第一個抵制。

我的第二個抵制是，我自己經驗了一種不成功，不成功在哪裡呢？就是吳永毅論文中，老同志們的差異觀點的團體對話那一整章是被他拿掉的，這篇「對話章節」的移除，就模糊了對承載衝突之社會關係的性質辨認。吳永毅有給我一封信，那封信說「妳如果願意，你們就要在一個月內生產八千字以內的版本放在後面」。我沒有選擇，我馬上回信跟吳永毅說不用了，因為我認為那個是不太合理的把人卡入一種出版時程與上架出書公開化的規格，我

airiti

的頭也放不進去！那沒有關係，我選擇面對任何可能的誤解、後果或者是好的發展。但是為什麼我說這是一個不成功，因為那一組焦點，就是我跟吳永毅和王芳萍、莊妙慈的焦點衝突，在他的論文最後一章，我們三個人和所有團體成員，大家都參與了三次非常冗長的對話，吳永毅有整理，資料都在裡面，所以大家去看他的論文會看得到，我覺得那裡面存在成員彼此之間關聯性、脈絡化的資訊，我當時是真的有個企圖，我是他的口委，又是衝突人，所以這兩個東西我都要搏鬥，我是搏鬥完之後，才去香港做他的口委，所以這個搏鬥，到了他的論文正式出來，再到出書的時候，我得承認我自己沒能成功。因為這個方法本身是沒有往前進的，沒有成功是站在我曾經努力過的「對話方法」的立場上，我沒影響成功，但我可以不同意，所以我抵制這本書將同志們參與對話篇幅的刪除動作。

再來，還有一個比較糟的狀況，在開始讀第一次的時候，我再一次進入了無效和無必要的勘誤勞動，我在讀吳永毅論文的時候，論文最後一章有寫，我大概是提供勘誤表最多、最勤勞的一個，洋洋灑灑列了十七處，然後我也都有回應、甚至在方法上提出給吳永毅建議，這其實不應該是我這一次讀此書要做的工！可是我沒有辦法控制，我就滑進去了，這讓我的眼睛痛了兩天，我還打電話給幾個老同志，因為記憶有些地方模糊了，我自己進入了一種狗尾續貂的樣子，就是想去考察他的細節，有一個老同志跟我說：「老夏，妳不要去搞這種事，妳進入細節妳就死定了！」但是我還是忍不住，今天我就順便跟吳永毅說，如果你會第二版，有一些地方一定要改，429頁，就是妙慈沒有懷孕，懷孕的不是莊妙慈，第二版一定要更正。再來，吳正桓也不是我的諮詢對象，吳正桓是我年輕時候的好朋友，所以1983年我和鄭村棋在D.C.的時候，他來找我，他從Georgia打電話給我，我就推薦他去參加讀書會。對鄭村棋而言，吳正桓是他眼中很俊秀聰穎的男人，所以我們之間關係的性質和書中認定是不同的。紅衫軍我也不在場，那時候我在照顧我媽，我大部分的時候不在場。這是讓我自己痛苦的地方，我又落入了一個其實不必要的勘誤勞動。

最後我停在一點上，這點會聯繫到我在心理系教書多年的另外一個痛

苦，就是針對某一種矛盾衝突的敘事的一種封閉性的、還是敞開性的困擾，我們心理系，每年都會進來很多新的研究生，進來就說我來就是為了要說故事，我就是說我自己，他非常理直氣壯，我的很多左翼朋友一開始對我也只有這個誤解，或者不理解，覺得我就是帶別人說他自己的故事，其實我天天都在心理系處理這種內部細微的差異。我覺得將矛盾衝突重新編排組織成首尾一致的敘事，把傷口敷合起來，指著貼布說「運動傷害」的故事，是會付出一種敘事的代價，因為它很可能會犯了一些邏輯的錯誤。拉康就說過他反敘事！我和我的心理系學生，天天在做這個搏鬥。

我停頓在一個抵制的地方，這個停頓的「地方」可能讓我落後於形式的發展，但是我仍然要說，這種抵制性也是我的一個立足點，這個立足點帶給我正視這本書的精神力量。

我最後對書有個提問，書就在眼前，它是小說、是自傳，還是論文集？我曾為了前同志吳永毅的論文的方法而努力，為了同志而努力。然而，書出版後，取消差異敘事的選擇，轉進嫁接上異端生成的後記和跋，最後製成一本書的選擇與做法，是昭然若揭地存在於「成書」的過程中的。我此刻正在經驗，真的是正在經驗，我們所共有的過去，在性質上，就是過去的歷史了，我們曾共享的一段歷史，因著出書的動作，轉置到了一種文化歷史公共財的鬥爭場域中。「出書者」當然比「與談者」更具有文字權與鬥爭實力。這種關係質地的替換和質變是我此刻正在體驗的。

我尊重吳永毅的努力，他的書是有貢獻的。最後我只想說，書的公開出版不等於運動公共財的公共性發展，這是兩件事！我覺得運動歷史這種公共財，是要持續能夠發展成為社會活動，《左工》一書的公開不等於公共性。因為它得返身拆解得了「成書」此一動作所包裹的自身難題，才能得到敞開，走向公共性的機會。再重述一遍，《左工》成書的編輯選擇與成書的動作內含著一個策略：「運動組織經驗被特定成員將之外部化，並從而將『內部衝突』轉性成『內鬥』，且貼之以『運動傷害』的封棺式膠布。」

台灣這個社會是有進步的，在台灣，現在可以把左翼拿出來討論，所以我也很希望這本書可以帶動我們接續社會中的區隔和歷史中的斷裂，以及返

身的自我拆解。

今天我所說的，只代表我自己。我從前的老同志們，都沒有選擇在場，只有基層教師協會的侯務葵老師在現場，希望後面我們還可以努力創造條件一起往前，左翼的實踐更該迎上這一波的三一八青年的努力！

謝謝！